

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 編輯整理及史料價值舉隅



丁故總幹事文江先生遺像

何漢威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古今論衡 第 12 期 2005.03

壹、丁文江其人及其在淞滬商埠督辦公署任內的文電

丁文江（1887-1936）是近代中國學人中兼具卓越專業學識及辦事能力的稀有人物。在他多姿多彩的一生中，最惹人爭議的就是 1926 年間在割據江蘇、安徽、浙江、江西、福建五省的直系軍閥孫傳芳下面出任淞滬商埠總辦一事。據胡適的說法，丁在 1926 年淞滬總辦八個月任內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將來作他傳記的人必定可以有詳細公道的記載給世人看。」^①胡適所說的那批文電，多年來毫無蹤影，是否尚存人間呢？答案是肯定的，收藏的地點就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在不到五十歲的一生中，丁文江不但是中國地質事業主要的創始人及奠基者；^②他所投身的事業，範圍更是多元而廣博，每一階段的工作多能作出相當的成績或貢獻。他死後，《獨立評論》第 188 號^③（1936 年 2 月 16 日）發行了「紀念丁文江先生」的專號，刊布了一系列由他的親友、學生撰寫的紀念文字；其中胡適的評論尤其代表性。「他〔丁文江〕是一個有幹才的人，絕不像我們書生放下了筆桿就無事可辦，所以他很自信有替國家做事的能力。……他不是革命的材料，但他所辦的事，無一事不能辦的頂好。他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就可以造出許多奠定地質學的台柱子；他辦一個地質調查所，就能在極困難的環境下造成一個全世界知名的科學研究中心；他做了不到一年的上海總辦，就能建立起一個大上海市的政治、財政、公共衛生的現代式基礎；他做了一年半的中央研究院的總幹事，就把這個全國最大的科學研究機關重新建立在一個合理而持久的基礎之上。他這二十多年的建設成績是不愧負他的科學訓練的。」^④甚至在巴黎時向胡適提過三遍，「回國後第一件事是殺丁文江」的傅斯

^①胡適，〈丁在君這個人〉，《獨立評論》188(1936)：12。

^②地質學家黃汲清指出，中國地質科學在初步發展階段（1912-1922）的先驅學者中，丁文江為「第一位地質教學機構即『地質研究所』的所長、第一任地質調查所所長、第一位發表地質礦產調查報告的學者〔即 1914 年發表於《農商公報》的〈調查正太鐵路附近地質礦務報告書〉〕、第一位遠征邊疆的學者、第一位進行煤田地質詳測并擬定鑽探計畫的學者、第一位發表中國礦產資源論文〔即“China's Mineral Resources,” in *The Far Eastern Review* (July 1917)〕的學者、第一位發表《礦業紀要》（與翁文灝合著）的學者。」見氏著，〈略述早期地質工作中名列第一的先驅學者〉，《中國科技史料》9.1(1988)：11-12；另參考頁 6-8。

^③除 188 期外，該刊第 189、192、193、208、211 等期也載有悼念丁氏的文字。以上載於《獨立評論》的悼念文字，加上日後發表於其他刊物的紀念文章，悉收入胡適等著，《丁文江這個人》（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67）一書，尤便於參考。

^④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3。按這篇論文，收入傳記文學出版社刊行的專書內，改題為〈丁文江這個人〉，並以之作為該書書名。又，胡適在 1936 年 1 月 9 日給周作人的信中說：「在君兄之死，真是一大損失。此君治學之外，實有辦事的幹才，不像我們書生只能拿筆桿，不能做事。」見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編，《胡適來往書信選》（香港：中華書局，1983），中：298。

年，1929年初夏與丁相識後，數年間雙方竟成爲極要好的朋友。他在一篇悼念丁的文章中認爲：「丁在君〔文江〕是『近代化中國』的大隊中最有才氣的前驅。中國若有這樣人二十個，又都在扼要適宜的地位，二十年後，我們庶幾可以成爲第一等的近代國家了。」^⑤傅氏的論述或引申過當，姑置不論；唯時人公認丁氏爲學事兼具的不可多得幹才，則爲不爭的事實。因此在進入主題討論前，或有必要先對這位被譽爲「學術界政治家」或「事業家」^⑥的人物作一個簡介。

丁文江，字在君，江蘇泰興人，生於富紳之家。十五歲時受泰興知縣龍璋賞識，在龍的鼓勵下赴日本留學。留日一年多的期間未進甚麼正式學校就讀。1904年3月離日赴英國攻讀。1906年考入劍橋大學（文科？），半年後因經濟不勝負擔而退學。他利用轉學到他校前無事可作的好幾個月空間，趁機前往歐洲遊歷。1907年夏到蘇格蘭葛拉斯哥（Glasgow），準備參加倫敦大學醫科的入學考試。1908年夏前往倫敦應試，因有一科不及格而落第；改入葛拉斯哥大學，通過初試後，以動物學爲主科，地質學爲副科。到第三學年（1910）時，猶有餘力，遂添加地質學爲主科，地理學爲副科。1911年初獲該大學動物學及地質學雙學位，同年4月乘船回國。他爲了遊歷和考察內地的地理、地質情形，作爲他日在西南調查工作的準備，於1911年5月初經越南西貢、海防，取道通車不久的滇越鐵路入雲南。在昆明住了兩星期後，5月底徒步出發，沿貫通雲南、貴州和湖南的驛道，從雲南入貴州省境，步行一個多月後經貴陽抵鎮遠，轉乘民船下沅江至湖南常德，再乘小貨輪至長沙。從長沙經漢口、南京，於7月底返抵家門。9月下旬趕赴北京參加學部遊學畢業生考試；10月放榜，獲授「格致科進士」。辛亥革命爆發後，他的家鄉泰興頗爲動蕩；他以鄉紳身分辦民團，維持地方秩序。

1912年丁執教上海南洋公學，任教化學、西洋史及地質學入門等課程；爲教學需要，課餘以生物演進的觀點撰寫了一部動物學教科書。1913年2月他應工商部礦政司司長張軼歐之約，到北京任地質科科長。當時地質學不爲時人重視，1912年北京大學地質門即因招不到學生而停辦。丁利用這機會，把北大地質門原有的圖書標本

^⑤ 傅孟真（斯年），〈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獨立評論》188(1936)：8。何炳棣指出胡適在1929年一次宴會上，介紹主客丁文江與陪客傅斯年時的原語爲「孟真，這就是你非要殺不可的丁文江」；傅氏則在前引文中「詳加洗辯，僅述其事而不保留胡先生原語，以致索然寡味。」參氏著，〈讀史閱世六十年：胡適之先生雜憶〉，《歷史月刊》70(1993)：74-75。按胡適歐遊期間於1926年8、9月在巴黎停留（參胡頌平編著，《胡適之先生年譜長編》〔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84〕，頁648-653）；傅斯年因對丁不滿而對胡說非要殺丁不可的話應在這時。

^⑥ 參陶孟和，〈追憶在君〉，《獨立評論》188(1936)：34；翁文灝，〈對於丁在君先生的追憶〉，全前，頁19。

借過來，開辦一個地質研究班，後稱地質研究所的教學機構（實質是地質專科訓練班）；學制為三年，教學過程中尤注重野外實習。1913年夏研究所在北京、上海招收中學畢業生，秋間開學。1913年6月丁文江與張軼歐商定，呈准工商部，改地質科為地質調查所，9月成所，由丁任所長，但只有所長而無調查人員，實際上是一空架子。1913年11月間，丁辭去地質研究所所長職；他與德國地質學者 F. Solgar 等人調查山西正太鐵路沿線地質礦產及填繪分幅地質圖。1913年年底他回到北京後，即被農商部派往雲南東部調查地質礦產。1914年2月初他從上海啓程，經香港、越南入雲南，在雲南除調查箇舊錫礦、東川銅礦外，還利用《徐霞客遊記》考察金沙江的水道，並留意搜集人種的資料，對當地土人作了若干人類學上的測量。1914年年底丁文江返回北京。因無其他人選可勝任地質研究所古生物課之教學，該學科遂由丁任教，是為「中國人第一次教古生物學」。1916年地質研究所的第一期（也是唯一的一期）^⑦ 畢業生經嚴格訓練後，大部分都進調查所；因這一批人的投入，地質調查所才得以正式展開工作。儘管經常因政局不安定及經費拮据的困擾，調查所仍在很短的時間內成為國際知名的地質科學及古生物學的研究中心，領導了中國史前考古學的研究，並使地質學發展為當日中國少數有重心及標準的一門學問。^⑧



民國三年五月丁文江為獐匪所包圍，幸經土司所派獐獐導解釋得免於難。

- ^⑦ 據翁文灝記載，丁堅持地質調查與地質教育「不應由同一機關及同一學者兼任」，地質研究所遂於第一期學生畢業後停辦。丁與北大校長蔡元培商定，北大恢復地質學系，擔任造就地質人才的工作，地質調查所則專力於調查研究方面。參翁文灝，〈丁文江先生傳〉，《地質論評》6.1/2(1941)：183。
- ^⑧ 丁在〈科學化的建設〉一文中，指出「地質調查所是全國科學機關成績最優秀的，他的職務比〔中央研究院〕地質研究所複雜得多，……政府每月給他的經費只有六千元，事實上不足他所需要的四分之一。」見《獨立評論》151(1935)：12。陶孟和認為「他〔丁文江〕創設地質調查所，奠定了今日行政機構裡，最科

1918年年底丁文江與梁啓超、蔣百里等赴歐洲考察大戰後狀況，並任中國出席巴黎和會代表團的非官方代表。1919年初丁在歐洲找到李四光，請他學成後回北大地質系任教。1920年初丁經由美國回國；在美國時，力邀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的古生物學大家 A. W. Grabau 到中國領導古生物學的教學與研究，由北大地質系及地質調查所合聘。1921年6月因家庭經濟負擔，丁辭去地質調查所所長職位，只任調查所不支薪的名譽所長，到熱河專辦北票煤礦，出任官商合辦北票煤礦公司總經理，而該公司董事長則為在農商部次長任內，大力支持地質調查所預算經費五萬元在國務會議通過的企業家劉垣（厚生）。因公司辦事處設在天津，丁把家搬到天津，他本人則經常往返於北京、天津、瀋陽、北票間。經兩年悉心籌備及規劃，該礦每日最高產量逾兩千噸，年產量提高至 144,758 噸，算是當日一個很有成績的新式礦業。因煤礦及運煤的鐵路都在奉系軍閥張作霖的勢力範圍內，丁文江必須不時前往瀋陽和當局洽公，他認識張學良及研究奉系及奉系軍事組織亦開始於這時。1922年5月丁和胡適等知識分子發起辦《努力周報》，發表〈少數人的責任〉、〈我們的政治主張〉等有代表性的文字，鼓吹「好人政府」的政見。1923年4月針對張君勱在《清華週刊》上發表〈人生觀〉的演講稿，在《努力周報》提出〈玄學與科學〉一文，批評張氏的論點，從而掀起持續半年多，頗為轟動的「科學與玄學」的論戰。

因丁的學識、能力及表現，加上其在文教界的影響力有增無已，遂受到實力派軍人所重視。1924年9月負責管理美國退還庚子賠款的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成立，他被推為中方董事的一名成員。1922年12月英國政府決定退還庚子賠款，並規定組織一個由中英雙方組成的顧問委員會，商定把該款用於兩國最有互惠利益的用途上。1925年3月該案在英國下議院通過二讀；他受任為中方三名委員之一（另二人為胡適及王景春）。⁹ 1925年7月經羅文幹介紹，丁到湖南岳州與吳佩孚會面；8月的一星期內，他到杭州與準備出兵援蘇的孫傳芳談了五次。1925年底辭北票煤礦公

學的、科學上最有成績的組織。他首創訓練地質人才的機關。……結果為中國造成了比較任何科學部門多的實際工作的學者，還有幾位在國際學術界可以立足的權威。」大約在 1930 或 31 年間丁對陶說：「中國的地質學現已經進到這個地步：就是無論在中國或外國畢業的地質系學生，無論他是學士或博士，他都可以認識他在中國地質學界的地位。現在中國地質工作的質與量都擺在這裡，任何人來了提出他的工作，他的地位便決定了，不容胡吹，不許瞎捧的。」陶的感想是「至少地質學已經在中國成了一種學術，有它的重心，有他的標準，有它的空氣，節節進步，將與國際學術界齊驅，冒牌及外行不能羸雜在裡邊。地質學在中國所以有這樣的成就，自然有賴於許多青年學者繼續不斷的努力，然而大功卻不能不歸給在君。……在君，後來加上翁詠霓〔文灝〕先生，在二十年間，在惡劣的軍閥時代，在腐敗的衙門風氣之中，不特維持而且發揮了一個服務而兼研究的科學組織，絕非常人所能及。」見氏著，〈追憶在君〉，頁 33。

⁹ 據英哲學家羅素《自傳》中指出，丁文江及胡適得被任為中英庚款顧問委員會中方委員，是得自他的一夥人推薦。見 Bertrand Russell, *Autobiography* (London, Boston, Sydney: Unwin Paperbacks, 1978), pp. 366, 383.

司總經理職。1926年2、3月間作為英國庚款委員會的中方委員，丁文江陪同以Willingdon子爵為團長的中國訪問團在上海、南京、杭州訪問。5月5日統治江蘇等五省，並自任淞滬商埠督辦的孫傳芳，任命丁為淞滬商埠督辦公署總辦（相當於市長）。在八個月任內，^⑩他重要的政績有二：落實「大上海」計劃，把租界四周的中國地區統一於淞滬商埠督辦公署這個新的行政中心之下，以及收回公共租界的會審公堂。1926年11月孫傳芳在江西兵敗，被國民革命軍逐出，往天津求援於奉系張作霖；丁對此提出異議而不被接納，遂於年底辭職，避居大連。

丁文江避居大連一段時間後，又重作馮婦，從事地質調查工作。1928年夏前往廣西，因受廣西當局的決心及誠意所感動，遂決定在當地作地質礦產調查，11月初才返抵上海，不久回到北平。1929年地質調查所發起，對西南地質分段進行大規模調查，以丁任總指揮。1930年夏他才從西南結束調查工作，回到北平。1931年秋蔣夢麟出掌北大，厲行改革，丁被聘為北大地質系研究教授。九一八事變後，他與胡適邀集蔣廷黻、傅斯年等創辦《獨立評論》，1932年5月在北平出版。他是該刊物出力最多的投稿人之一。1933年夏他赴美國參加第16屆國際地質學會大會，回程從歐洲取道蘇聯回國；他在蘇聯作了近兩個月的參訪，並在《獨立評論》上陸續發表了19篇〈蘇俄旅行記〉。在蘇的所見所聞，他感觸很深；回國後，他極力宣揚「新式的獨裁」，指出國民黨的專政是假的，是舊式的專制。

在北大作了近三年地質學教授，1934年6月應蔡元培邀請，繼楊銓遺缺，他接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任內最重要的規劃即為設立評議會；編製預算方面，打破各所經費平均分配的習慣，使院中各項事業的緩急輕重有伸縮空間。他又把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設於北平的社會調查所合併於中研院社會科學研究所，以社會調查所原所長陶孟和為所長，並把該所原有的民族組劃歸歷史語言研究所。1935年12月受鐵道部長顧孟餘委託，赴湖南勘查粵漢鐵路沿線煤礦；同時教育部也委託他到湖南視察，準備抗戰爆發，華北危急時，學術機關能安然南遷。12月8日在室內煤氣中毒，腦中樞血管破壞，當地醫師救治不得法，15日移送長沙湘雅醫院調治。1936年1月5日去世。^⑪

^⑩上海市檔案館譯，《顏惠慶日記》（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6），第二卷，1926年部份，整年中不時載有顏在北京與丁的交往。按：丁文江是年五月至年底都在上海，無北上的記錄，初百思不得其解，後細閱該書，方知丁文江者，乃據英文名字V.K. 逕譯；譯者或昧於當日歷史背景，竟不知書中這部份所載的V.K. 為另一人，即是年7月起出任署司法總長的羅文幹。

^⑪有關丁文江生平，參胡適編，《丁文江的傳記》（台北：胡適紀念館，1973增訂版）；劉厚生，《丁文江傳記初稿》（按：這一資料為劉氏寫於1950年的油印稿，附於《胡適日記全編》[曹伯言整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1956年3月12日條[8：397-432]）；王仰之，《丁文江年譜》（江蘇教育出版

1926年8、9月間傅斯年在巴黎與胡適會面時，即對胡連說三遍非把丁殺掉不可的話；丁去世後，傅在悼念文章中解釋他有這種反應，實因「以為如此人才，何為仕於錢鏐之朝，又與呂惠卿輩來往，所以才有『殺之一說』。」¹²這正是當日「最為一般有革命性或冒充有革命性所最不了解或責備。」¹³事實上，隨著國民革命軍北伐告捷，孫傳芳勢力土崩瓦解，丁也被國民政府列於通緝名單內，儘管這一通緝令是名多於實的。¹⁴即使很賞識丁能力的孫科，當1928年底尚未與丁會面前，丁的友人，時任鐵道部建設司長的陳伯莊向身為部長的他建議，請丁擔任東南及西南沿線計劃修築的鐵道線作地質調查時，孫厲聲說：「為什麼推薦一個反革命的腳色」¹⁵對在大革命潮流中的這段經歷，丁的感慨是「當革命的時代，如我這種人實在不適用。……行政方面，我自信頗有能力，在上海的試驗，尤足以堅我自信。」¹⁶他對胡適自嘲說：「我們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亂世之飯桶罷！』」¹⁷現在距離丁去世快七十年了；可是，我們尚未見為他作傳的人，就他在淞滬總辦任內的政績表現，以這批文電立論者。這批文電的下落如何？內容怎樣？有何史料價值？凡此都正是後面所要討論的。

社，1989）；翁文灝，〈丁文江先生傳〉；吳湘相，〈丁文江走遍全國探寶藏〉，載氏著，《民國百人傳》（台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1），1：271-298；耿雲志，〈丁文江〉，載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1（北京：中華書局，1978）；朱庭祜，〈我所知道的丁文江〉，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80：17-24；吳健熙，〈淞滬商埠總辦丁文江〉，載楊浩、葉覽主編，《舊上海風雲人物》（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王衛星，〈近代地質學的先驅——丁文江〉，載《江蘇文史資料》編輯部編，《江蘇名人傳》（南京，1997）；蘇雲峰，〈丁文江〉，《中華民國名人傳》第四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5）；孫榮圭，〈丁文江〉，載《科學家傳記大辭典》編寫組，《中國現代科學家傳記》（北京：科學出版社，1997），5：326-331；Charlotte Furth, *Ting Wen-chiang: Science and China's New Cultur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Wong Wen-hao, "V. K. Ting: Biographical Note,"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16 (1936-7); "Ting Wen-chiang," in Howard L. Boorman and Richard C. Howard eds.,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New York and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0), 3: 276-282.

¹² 傅孟真，〈我所認識的丁文江先生〉，頁8。

¹³ 傅孟真，〈丁文江一個人物的幾片光影〉，《獨立評論》189(1936)：9。

¹⁴ 丁在1927年6月9日給胡適信中說：「蔡先生〔元培〕所說通緝的事，請你再打聽。因為我也聽過南方通緝多人，陳陶遺〔孫傳芳掌政時任江蘇省長〕為首，我也在內。其後陶遺有信來說，並未實行，所以他安然回家鄉去了。」1928年4月27日丁在給胡適的另一封信中說：「據〔劉〕厚生同〔蔣〕百里說，蔡先生所說的通緝的事，並未成為事實，你能不能向蔡一探。」分別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437, 480；耿雲志主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合肥：黃山書社，1994），23：86, 103。另參《丁文江年譜》，頁38-39。

¹⁵ 陳伯莊，〈紀念丁在君先生〉，載氏著，《卅年存稿》（香港：自印本，1959），丙：8。按陳於1928年11月13日就任司長，翌年12月16日免職。

¹⁶ 《胡適來往書信選》上：436。

¹⁷ 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13。

貳、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的收藏原委、編輯整理

本人最初知道史語所藏有丁文江檔案是 1996 年圖書館委員會委員任內；在一次圖書館委員會會議中，知悉史語所典藏的檔案中有丁文江檔案一種。當時我雖對該檔案感興趣，但沒有打算按圖索驥，進一步追尋檔案的具體內容。1998 年十月下旬時任四川大學歷史系教授的羅志田先生應邀來所，參加史語所成立七十周年研討會；會後，時任史語所所長的杜正勝院士請羅教授就該檔案整理出版的價值作一個評估。12 月 4 日羅教授離台前夕與本人匆匆一晤，交來一份很簡單的評估意見及一份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目錄，另有幾件該檔案的影印件；閱後我即認識到史語所典藏的丁文江檔案就是胡適所說丁文江 1926 年淞滬總辦任內的那批文電。

這批文電為甚麼會流到史語所來？我曾經好幾次就這一問題向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相關人員查詢，因所方沒有留存該批文電的收藏紀錄，是以不得要領。在這情況下，本人只好爬梳，並推敲相關資料，提出一個較為合理的臆測。根據丁在 1935 年 2 月 22 日在北平所立的遺囑（由其四弟文淵及竹壺生為執行人；胡適及翁文灝為見證人）的內容中第三款一項：「余所遺文稿信札，統由余四弟文淵、七弟文治整理處置之。」¹⁸ 丁文江逝世四十天後，胡適在一篇悼念丁的文章中說，丁在 1926 年淞滬總辦八個月任內的文電，「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1936 年 3 月 16 日丁的四弟文淵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現在大約先就行政院參議的事，薪水有三百元，一時只好勉強過去再說。關於整理我二哥文件的事，將來有機會再面談吧。」¹⁹ 胡適提到的「一個好朋友」是誰呢？丁文江的二位弟弟有沒有如其兄的遺命，整理其「所遺文稿信札」，包括那批淞滬總辦任內的文電呢？²⁰ 從一些零散記載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來推斷，「一個好朋友」應即為丁的至交，1913 年即一起共事，並自 1921 年起繼他接掌地質調查所（1921-1926 年為代理所長）的翁文灝；丁的二位弟弟，特別是文淵，始終沒有整理其兄「所遺文稿信札」的機會。據丁文淵所言，1933 年 3 月他回南京不久，向家人問及其兄的遺作下落，家人告訴他，丁文江死後，所有遺作都被

¹⁸ 竹壺生，〈丁在君先生之遺囑〉，《獨立評論》211(1936)：19。

¹⁹ 《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3：276。按：這封信是丁文淵剛從德國 Frankfurt 回到南京時（1936 年 3 月）寫的。見丁文淵，〈前言〉，收入丁文江、趙豐田編，《梁任公先生年譜長編初稿》（台北：世界書局，1958），頁 8。

²⁰ 經數次向傅圖探詢丁的那批文電如何由史語所收藏未果後，去年 4 月 24 日我曾以此問題向對所中典藏相關檔案至為熟悉的同事，現擔任所長的王汎森教授求教，他的意見是史語所藏的該批文電可能得自丁文淵。

翁文灝拿走了。他向翁問及此事，翁說：「你老兄家並沒有什麼遺著！在我這裡的，只有他在雲、貴、川三省調查的報告。這是一部專門的著作，又不是你所能懂得的，還是讓我替他整理代印吧！」²¹事實真相究竟如何？胡適寫那篇文章時，丁文淵還留德未返；就胡文字裡行間來看，「現在都還保存在一個好朋友的家裡」，如果不是丁文江生前的主張，至少在他死後，他的好友如胡適等也認為這是一項合理的安排。至於丁的七弟文治對此未見提出異議，甚有可能根本不知有這批文電的存在。²²丁文江把其未整理好的稿件交翁文灝，或出於兩種考慮：一、丁家兄弟之間的關係似欠融洽，²³丁文淵是時又不在國內；二、如一時不放心交給家人，則遺稿文電只好交一位最可信賴的人保管，翁是不二人選；二人不僅交誼非比尋常，翁文灝更是丁最為敬重的朋友。²⁴至於在翁文灝手中待整理的丁遺著，當不止如他對丁文淵所說，僅止於西南三省的調查報告，其實那批丁在淞滬總辦任內的文電，以及丁所編著的梁任公年譜未刊稿也包括在內。我懷疑翁確實有意把丁文江那批文電整理出來。根據翁的自白：「丁文江對具有政治性質的活動，從不對地質同人談及。因此我對他的政治生活並不知道。……丁文江死後，我因要略知他跟孫傳芳的經過，曾往上海訪問我原不相識的陳陶遺。陳曾做過江蘇省長，他所說似乎有些根據。」²⁵他此行專訪陳陶遺，很可能專為此事。由於種種原因，保存在翁文灝手中那批文電始終未見整理出來。

²¹ 丁文淵，〈前言〉，頁8。

²² 丁文治在1936年2月20日寫給胡適的信中提到：「第一、我要整理他的遺著。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幾種最難的（地理、地質、人種）已有專家負責，翁文灝先生也特別注意此事，可以放心。……他〔丁文江〕又要說要寫一本中國通史；……這一書恐怕他只有一腹稿，唯一的遺稿要算“*How did China acquired her civilizations*”那篇文章了。此外，我新近覺得他的著作雖然很散漫，但搜集起來還不很困難；最重要的有兩個時期：一是《努力》時代，一是《獨立評論》時代，這些地質、地理、人種以外的文章，似乎可以出一分類的文存或遺集。……他的英文寫作的文字很好，似也值得出一本專書。留學時代的筆記本和旅行的雜記本，也要想一適當的位置。」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3：270-271。信中顯示他所要整理者幾僅是把丁文江已刊行的論著分類編輯，全未見他提及那些未刊的文稿，遑論那批淞滬總辦任內的文電？

²³ 丁文江死後的第二天（1936年1月6日），翁文灝給胡適的信中說：「在君竟不能救，悲痛萬分。此時有許多具體問題急待解決：……（二）在君之弟兄中，意見不一，諸弟皆不願以在君死信〔訊？〕告知老兄〔文濤〕，老兄又欲以其子承繼在君，因而取得財產。」參《胡適來往書信選》中：295。另外丁文治在1936年2月20日寫給胡適的信中說：「我哥已死了，喪葬事如何如何，現在看來是比較小的事，重要的是生者（他的這幾個罪孽深重的小兄弟）如何活的對得起他。不，他們自己如何求『心之所安。』他這個人一生可以說沒有做過什麼失敗的事業，唯一失敗是在他的兄弟上：前後二十四年我們一個一個給他的失望。……先生是最明白我們的家事的，像我家這個大家庭，人口如此之多，良莠當然不齊。我二哥的去世，對於任何的家人均是極大的痛苦，故想對二嫂盡心以報答死者，全是熱心有餘，但客觀條件（如職業、收入、性情、家眷）沒有一個人能滿足的（我自己當然在內）。……先生曉得在南京他〔丁文江〕和我分開住家，完全因為我嫂反對婚事的關係〔指丁文江妻史久元反對丁之弟文治與她的姪女史濟瀛結婚〕（她之所以反對也是為我們的）。」見《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3：270-273。

²⁴ 丁對翁的推崇備至，見他所撰的〈我所知道的翁詠霓〉，《獨立評論》97(1934)。按丁文江常對翁說笑話道：「我根本不相信世上有聖人，若是有，你總要算一個。」（頁5）。

²⁵ 翁文灝，〈關於丁文江〉，《文史資料選輯》80：35。按：這篇文章寫於1965年11月28日。

1940年丁文淵在德國知悉翁文灝在行政院秘書長任內，把藏於地質調查所的其兄編著的梁任公年譜油印二、三十部，分發梁啓超的親友，請他們審核評注寄回。1941年丁文淵回重慶，向翁索取這一部著作；翁不肯交出，並說：「在現在這種戰亂的時候，我只能交給一個國立的學術機構保存，方算是對得住老朋友！」²⁶約在1943年或稍後他即將這份油印年譜稿交給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²⁷我懷疑很可能丁在淞滬總辦任內那批文電也在這時一併歸於史語所。由於內容敏感，加上戰事及動亂，文電整理自然無從談起。史語所遷台後，多年來因條件所限，文電於是只能塵封箱內。一直至數年前，傅斯年圖書館擴建的新大樓落成後，1997年3月開始整編該所典藏各類檔案；這批文電亦冠以「丁文江檔案」之名，編成初步檢索目錄，陳列於善本圖書室中。

據史語所編丁文江檔案目錄所示，全部檔案逾千件，共60卷宗，分裝於16個大號文件夾內，中文文電佔絕大多數，外文的相對甚少，其中以英文為多，也有少部分為法文及日文。卷宗之間的檔案數量、檔案之間的數量篇幅多寡差異甚大；同一編號檔案中，或僅有一件，或包含多件，每件少則一、二行，多則十數頁。這批文電中，原卷宗58-60打印稿全屬民國時期軍事史範圍，我懷疑是丁1926年所出版的《民國軍事近紀》（上海：商務印書館）的底稿；丁以這一批屬於長編性質的稿件為基礎，去蕪存菁，撰成《民國軍事近紀》這本篇幅不多，卻饒具價值的北洋時期軍事史論著。²⁸這批軍事史文稿應是丁在孫傳芳下面任事以前所撰，就內容及性質來看，應不屬於胡適提及的那批「1926年淞滬總辦八個月任內的文電」；可能不知甚麼原因，卻攙入到那批文電中。必須指出的是，丁文江淞滬總辦任內文電的實際數目，當較保存於史語所所藏丁文江檔案者超出很多。丁本人以案無留牘知名，「寫信如畫符，三分鐘一封，有信必答；」²⁹在淞滬總辦任內，「每日有公文二三十件，私信二三十封，這是照例的事，」³⁰即可印證前面推論當非無據。其次，丁當日不少文電，都是

²⁶ 丁文淵，〈前言〉，頁8-9。

²⁷ 1943年梁思永致函傅斯年說：「頃奉來示，敬悉。丁在君先生搜集關於先嚴傳記之材料，現全部在渝，欣喜非常。至將此項資料移至研究所保存並繼續整理之辦法，至為妥善，弟等自極贊成。即請我兄向翁詠霓先生洽收，隨身攜回李莊為盼。」見「史語所藏傅斯年檔案」（編號III：385）。此件資料蒙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博士賜示，謹此致謝！光哲博士並謂他已檢查傅與翁文灝的往來書信，唯均未見提及梁任公年譜及丁文江淞滬總辦任內那批文電轉到史語所收藏的事。

²⁸ 據來新夏主編，《北洋軍閥》（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參考書目提要」指出：「與其他書不同的是，該書〔《民國軍事近紀》〕以省進行分類，分別予以闡述，條理清晰，脈絡分明，史料價值很高，是研究北洋軍閥史的必備參考書。」見5：432。

²⁹ 見1927年8月16日丁寫給胡適的信。參《胡適來往書信選》上：442。

³⁰ 見1926年8月16日丁寫給胡適的信。參《胡適來往書信選》上：399；《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3：71。

隨手寫成便寄出，沒有存底；即使存於史語所丁文江檔案者，其中四件文電或因館員初步整編檔案時失察，未及把原藏於信封內的函件檢出編號，另為列示，致誤導使用者以為原件已失佚掉，³¹其他一件則或因內容敏感而被抽出，致原件付之闕如。³²

我接受所方委託整理丁文江檔案時，以為檔案已編有初步的檢索目錄，每件存檔俱已編號分置各卷宗，整理起來應不至有太大的困難；唯隨著工作的展開，先前沒有注意到或估計不足的困難漸次出現。整理丁文江檔案最初也是最基本的步驟就是由助理據原檔影印件輸入電腦打印。檔案文電中，中文的大部份為手稿，英文的也有相當部份是手稿，辨識文字便已花去不少時間；丁文江向以「寫字如畫符」及字跡潦草見稱，³³其實不但丁本人的文稿如此，檔案內大多數其他中文手稿，也存在同樣的情況。即使至今仍有部分文字未能認出，日後尚須求教於書道高明。這些中文手稿都無標點，我必須在打印出來的初校稿上加上新式標點符號。

檔案內有好幾分篇幅較長的中文明碼電報尚未譯出，³⁴我只好拿中文電碼本逐字譯出（內有部分電碼懷疑是亂碼，相應地譯出來的文字亦懷疑有誤或可資商榷；至於極少部分密電未及譯出者，³⁵我本擬參照檔案內其他用相同密碼的密電，試看能否一一譯出，後因耗時太多而奏效不大，只好放棄）。另外因部分檔案影印件字跡不清，須拿檔案原件核對；有時竟有意想不到的收獲，解決一些難題。³⁶檔案中，原董顯光卷宗編號 1-2 文件，件內日期為 1926 年 1 月 1 日，我因信中內容斷定日期不確，後來終於拿該件所附原信封核對，運用史學方法中最基本的內外考證，終肯定正確日期為 1926 年 11 月 1 日。³⁷

- ³¹見原編號 12-5、18-1、20-1 及 37-1 檔案，函件俱藏於信封內，未及檢出編號另列。該四件文電內容為特派交涉員許沅論辦理破獲偽造鈔票交涉經過情形；海軍陳紹寬感謝丁文江致電慰勉，表示如有相需之處，必當從命；梁思忠路過上海，其父啓超具函介紹，令謁見丁文江，以及張群勸孫傳芳及早覺悟。
- ³²最明顯的是原編號 13-3 檔案（羅文幹寫給丁文江信）僅存信封，上有小注：「第 2106 號 擬在外獨當一面以自效，望先事預為之地。函由總辦抽去。」
- ³³1927 年 8 月 16 日丁在寫給胡適信中說：「我寫信如畫符，……你常罵我潦草，然潦草有潦草的好處。」全註²⁹。另參胡適，〈丁在君這個人〉，頁 10。
- ³⁴如原編號 39-6 的三份長電（內容是國民軍系的代理甘肅軍務督辦劉郁芬報告與原直系的隴東鎮守使及原為皖系，後轉入直系的隴南鎮守使孔繁錦作戰的情形）、原編號 42-19 及 46-24 的電報（分別關於武漢及江西方面與北伐軍作戰戰情），俱為原來尚未譯出者；至於原編號 46-22 關於武漢戰情的那份電報，原來僅有部分內容譯出。
- ³⁵長電如原編號 42-18 寧密及 47-51 和密的密電；簡短的電報如原編號 39-4 津密（？致丁文江轉唐天如）及 47-8 生密（丁文江致劉厚生）。
- ³⁶最明顯的例子為原編號 34-2 的檔案，因影印件所附信封上所注的摘要字跡不清，我到傅圖拿原件核對，發現信封後原來還有如下批語：「孟蘋兄鑒：經秘書油池係政府強迫洋商在□罰建設，並不□彼方要求，各公司所購之地，原係濟浦局工程，□頗有問題，現已□交涉云。赴□再請求將來□可議，望公平解決。」從「孟蘋兄」的稱謂，從而知悉原信中字跡不易確認（目錄中即不列名）的致函者為蔣汝藻。
- ³⁷該件日期信中註明為 1926 年 1 月 1 日。但就函中內容鹽務稽核所會辦建議政府以鹽餘抵押，發行三千萬

打印出來的初校稿可說滿紙塗鴉，故二校稿仍有不少錯誤亟待校正。我初本以為只要根據史語所編就的初步檢索目錄，把打印二校稿編目即可。不過，在校正過程中我感到必須作出必要的因應，不能僅靠檢索目錄作編目的標準或指標。史語所編就的目錄，分類不愜人意之處頗多，卻仍有軌轍可尋，大略是按人或事作準則。可是，就目錄所見，很多文電分類並沒有緊守這準則，致編次顯得雜亂無章。³⁸例如，就丁文江檔案留存文電所見的人或事中，其相關文電多結集在一起，繫於同一卷宗內，但也有一人或一事而散見於數個不同卷宗者。³⁹多數情況下，函件及其信封列為一件，繫於同一編號，但不時也有把函件及其信封分列作兩件，標示不同編號者。⁴⁰更奇怪的是同一編號中所繫信函及信封，明顯各不相屬，卻誤認為是同一件來處理。⁴¹另外，有一些文電明顯應為同一件，但在編號時，因沒有發覺頁次散亂，卻分別編號，視為兩件不同文件處理。⁴²即使在同一卷宗內的人和事，其所屬的文電的編排顯得有點任

到七千萬元的債券的辦法，董顯光把這項計畫傳達給潘復，潘復託董向丁文江代為致意，並表示對丁在上海近日的出色政績引以為傲。如該信確實寫於1月1日，其時丁文江尚未到上海任淞滬商埠總辦，如何有政績可言？信中日期當有誤。再檢影印件信封正面上記的編號為第2954號，理應在1926年底或1927年初，懷疑1926當為1927的筆誤。即便如此，仍未能盡釋存疑；丁是時已因交通意外，養傷而提辭呈，復與孫傳芳政見不合，離職實意料中事。董、丁交誼匪淺，論理應不會有寫此信的必要。於心不安，只好求助於原件解決困惑。終於找出原信封，封面上的天津郵局郵戳極為模糊，仍可依稀認出日期為1 Nov.（我所持的影印件則無法辨認）；信封背後則貼編號0643的快遞郵件條紙，並蓋上海郵局郵戳3.11.26。內部及外部證據都表明這封信當寫於1926年11月1日。附帶應一提的是從這封快郵的收發日期可見當日即使戰亂頻仍，郵政部門（至少部分地區）仍是相當高效率的機構。

- ³⁸據2003年9月5日傅斯年圖書館湯蔓媛、廖淑媚小姐來函，丁文江檔案屬於尚待整理，「僅有個人編號的個人檔案。……此部份檔案僅就原始順序給予初步編號而已，如同書籍之給予登錄號一般，並未有詳盡之分類編排，而未造整理前以整理檔案原理原則：尊重原始秩序。」
- ³⁹以人而論，如：陶孟和致丁文江函，丁文江檔案中所收三件，內容都與勞工問題有關，卻分見、散見於原編號17-12、21-12、55-2的三件檔案中；以事而論，卷宗15共收檔案二件，原編號15-1及15-2，前一件是關於軍需處月撥淞滬督辦公署經費洋一萬元的事，後一件則為中國銀行張公權、王克敏答覆丁關於蘇、浙、皖、贛、閩五省內銀行鈔票發行及徵收發行稅事，二者內容不同，不宜混為一談。相反，原編號15-2的檔案須與原編號39-5及39-6兩件檔案合而觀之，才對徵收發行稅事的原委有較為完整的認識。
- ⁴⁰這類情形在丁文江檔案中所在多有，不勝枚舉。最奇怪者莫過於原編號55-12上注「述與Francis晤談情形，並望切勸聯帥確定方針」的信封，分明即屬於原編號1-1檔案者，卻分成兩件，且置於編號完全不同的卷宗。又如原編號24-10那件，實即原編號24-11傅宗耀致丁文江函及其附件（原編號24-7傅宗耀致孫傳芳電）的信封，應視作一件，不應另作編號。其實，只有在原信已佚的情況下（如原編號12-5的情況，參注³¹），另行編號或較為合理。唯據傅圖湯蔓媛、廖淑媚小姐2003年9月5日來函，指出傅圖對「信封之判斷，除非是信件原為信封取出，且郵戳日期合理，方能歸為一件，否則信封亦只能給予另一編號。」
- ⁴¹茲舉一例可概其餘。原編號37-1的檔案包含一封信並附信封，信是1926年7月2日顧頡剛寫給丁文江，內容是請求丁以退還英國庚子賠款支持其歷史研究事業；可是，信封上卻有「丁在君先生大啓 勸孫聯帥及早覺悟 張群」的小注。這信函及信封分明是各不相屬，卻錯誤地混在一起。
- ⁴²最明顯的例子為孫傳芳向各界公布其致國務院及關稅會議委員會的電報，原件共兩頁，但不知甚麼原因弄散掉，致檔案編目時視作兩件（原編號42-25及42-2），事實上，這兩件應併為一件。又如原編號40-53及40-54的兩件檔案（內容為丁文江致電孫傳芳及劉京紀，闡明其面對浙江省長夏超鬧獨立時所作的因應措施），實應合併為一件。據2003年9月5日傅圖湯蔓媛、廖淑媚小姐來函，提到「案件凌亂：函件殘缺不全時，亦只能於編目時暫記，俟日後若發現有相同部份，再將其歸回。」

意，並沒有按日期先後順序編列，致檢按時因次序先後不明而不易掌握要領。因此把檔案內文電分類及按日期先後順序重編，實為必要之舉。後一項工作性質較為機械，處理尚不算困難；對於前一項工作，我雖小心從事，仍有失諸武斷之虞。我對相關文電的分類處理，基本上仍遵循人或事作準則，但作出必要的調整；基本上，對檔案中涉及的人物來說，我先視其與丁個人關係的親密程度，再按其所屬界別（如：學、政、經、軍等）加以區分。大體來說，我幾乎把整個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重新分類編目，但在新的編號後加一個括弧，內保存原來的編號，以便日後使用者對我所作的這一工作有所質疑時，可隨時覆按原件求證。鑒於丁文江的《民國軍事近紀》已面世多年，丁檔原卷宗 58-60 軍事史文稿數量不少，又為丁任淞滬總辦前所撰，且屬長編性質，故我只選取原編號 58-1、58-2、58-6、58-7 及 58-8 的五件似尚沒有收進《民國軍事近紀》的檔案作樣本來整理。⁴⁵至於內容不能歸類或殘缺的文稿，另立卷宗，附於相關各檔之後。我本擬對新編號各卷宗內容作簡單介紹，因重新編目的新目錄尚未編就，這裡只好暫時打住了。

丁文江檔案涉及的人物不少，唯文電中多以別號稱謂，不用說對一般人，即使對民國史的專業工作者來說，實為一項困擾。另外，檔案中一些歷史事件或名詞，對於使用者來說，或多或少也會構成一些困難。在這情況下，對檔案中的人、事及名詞加以注釋，應有其必要，儘管這樣作會增加我的工作負擔。隨著大量民國歷史辭典或相關工具書的面世，從事這一項注釋的工作，與從前相較，可說事半功倍。不過在注釋的過程中，我也注意到即使是被學界認為是高水準的人物辭典，不時也出現一些不可原諒或不可思議的錯誤，遑論一般的相關參考工具用書了。工具書的大量面世，固然提供注釋工作莫大的方便，但同時也引起一些困擾，特別是關於檔案中出現的人物生平的一些細節方面，不時出現莫衷一是的情況。⁴⁶對眾說紛紜的記載，如我能判斷其

⁴⁵ 鑒於原編號 58-3、58-4、58-5 檔案內容為「廣東軍事簡報校稿」，已於 1987 年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以《廣東軍事記》為題刊行，收入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六輯內，故我沒有對之加以整編。

⁴⁶ 在眾多的民國人物辭典中，書出眾手，成書四大冊的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最為知名。可是我在注釋檔案提及的人物時，察覺到書中竟出現一些不應有的錯誤。〈張伯苓〉條謂：「中共軍隊 1948 年冬佔領天津時，張留在該城；1951 年 2 月 23 日因腦溢血逝世，享年 76 歲」（1：104）；按 1949 年國共內戰，南京易手前夕，時任考試院長的張伯苓逃往重慶。同年 11 月蔣介石父子至四川作最後部署前，11 月 27 日蔣氏父子尚於重慶沙坪壩拜訪過張氏。1950 年 5 月他返北京，後回天津定居（參蔣經國，《風雨中的寧靜》[台北：正中書局，2003 台二版]，頁 261；宗志文，〈張伯苓〉，載李新、孫思白主編，《民國人物傳》第二卷[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309）。〈賀耀組〉條謂：「1938 年駐蘇大使蔣廷黻回國。在較其他文官或職業外交官更為明白戰時中國需要為假設的前提下，賀耀組作為特使，被派往蘇聯。他在莫斯科的巡迴任務以簽訂兩國間一項商約及締結數項以貸易貸協定，藉以提振中國的作戰努力而著稱。1940 年邵力子被任命為駐蘇大使，他從俄都被召回國。」（2：78）這真是張冠李戴，把其時任駐俄使職的楊杰，誤認作賀耀組（參考並比較 4：4）。按賀於 1937 年春卸任駐土耳其大使後，一直留在國內，1940 年 4 月前歷任代甘肅省主席兼省政府委員、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等職。原編號 26-13 檔

是非正誤，當然是擇善而從；因檔案涉及的人事頗多，若我對紛紜的記載一時無法解決時，則消極地以闕疑的態度處理問題。最初我對注釋工作本打算力求簡略；由於注意到前述的情況，遂改變初衷，力求詳明一點。至於這樣是否會喧賓奪主，實沒有把握，有待高明教正。

我從事編輯整理丁文江檔案，開始時靠著史語所傅斯年圖書館編就的目錄作指引，使我能較快的進入情況。可是，涉足愈深，愈益感覺目錄未能盡量發揮按圖索驥的作用，有時反會誤導使用者。例如原卷宗 1 所收檔案中，收發信人中，只各有一件除外，發信人全為董顯光（Hollington K. Tong），收信人則全為丁文江。目錄卻因信箋印有順直水利委員會或庸報社標識，誤認這兩機構為發信者（參目錄原編號 1-2、1-4、1-7、1-8、1-9、1-17）；另原編號 1-10 檔案，因信封印有揚子水利委員會，目錄遂以該機構為發信人；董寫給丁文江信函，內容或涉敏感，董以丁的摯友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為收信人，再由徐新六用上海浙江興業銀行信封把信轉寄給丁文江。編目者或沒細看信件內容，僅就信封所示，遂在目錄中視作上海浙江興業銀行徐總經理致丁文江（參目錄原編號 1-5、1-6、1-15 及 10-1 檔案），凡此可謂差之毫厘，謬以千里。原編號 1-17 檔案明為董顯光致 Chin Fei（振飛，即徐新六），目錄卻不知何故，誤作 Hollington K. Tong 致 V. K. Ting（丁文江）。原編號 10-3 檔案，目錄編者大概只據函中稱謂，對收發信人身分沒有查證，逕作恩溥致振飛，此應更正為唐恩溥（天如）致徐振飛（新六）。原卷宗 13 中，發信人羅文幹悉誤為羅幹。鑒於目錄錯誤甚多，另起爐灶重新編目，實在有其必要。

案所提到的王霖之君，即高等學堂德文班畢業，1909 年入京師大學堂格致科大學地質學門，1913 年 2 月赴德留學，入柏林大學脩讀地質、礦物及岩石學。1917 年北大地質學門恢復招生後，回國任教於該系，並於 1924-7、1929-31 年兩度出任系主任的浙江蕭山人王烈（1887-1957）。參于洗，〈北京大學地質學系早期史考〉，載王鴻禎主編，《中國地質早期事業史》（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頁 97, 99。但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頁 26，「王烈」條謂王為浙江金華（一作蘭溪）人，清拔貢。後赴日留學，入讀法政大學，獲法學士學位。回國後，1912 年任參謀部軍事秘書；翌年當選為眾議院議員。國會解散後，回浙江金華創辦南華中學，並出任校長。國會恢復後，仍任眾議員。1921 年任北京大學地理系教授。1926 年任北大總務長兼地質系主任。1931 年任北大秘書長兼地質系教授，並任編譯組礦物學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另陳玉堂編著，《中國近現代人物名號大辭典》（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頁 48，略同。我懷疑這兩本頗具價值的工具用書把同姓名的兩個王烈混為一談，從政者當為另一人。原編號 37-4 及 37-5 檔案提到的瞿鐵（丁文江自哈爾濱聘任為科長者），後面二本工具書所載，同中存有差異。參陳玉堂編著，前引書，頁 978，「瞿鐵」條及《1840-1998 上海名人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2001），頁 594，「瞿紹伊」條。前書缺出生年，謂瞿於 1939 年 6 月在上海被敵偽刺殺身亡。後書則列其生卒年（1880-1953），謂「抗日戰爭爆發後，[瞿]遠走川、陝，主持《正報》筆政，抗戰勝利後回鄉，盡力整建浦東各項事業，主治都台浦、馬家濱兩條河疏濬工程。主持浦東同人會會務前後四十餘年，其中任常務理事二十餘年。建國後，參與新法學研究會活動。」我在參考相關資料後作出衡估，認為後書所載較為可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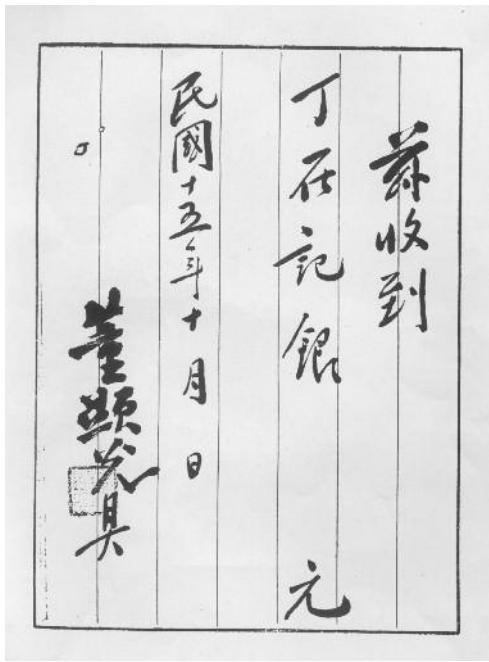
參、史料價值舉隅

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內容以丁在淞滬總辦任內涉及或負責的政務為主體，特別是孫傳芳治下五省的軍政狀況（包括南北關係與北洋派系的內部分合、北伐前期的戰況、五省的地方意識、內政〔涉及國、共主導的政治活動〕和對外關係）；就史料價值言，固然彌足珍貴，而檔案中一些與公務無關或關係較少的私人來往函件，也不乏饒富意義的史料。透過這批檔案，我們對期間丁文江與軍、政、經、學、報各界中上層人物，包括翁文灝、蔣百里、孫傳芳、陳儀、羅文幹、梁啟超、徐志摩、徐新六、劉厚生和董顯光等以至外人如 R. F. Johnson 及 J. G. Andersson 等所交織成的人際關係網絡，他與各方力量的互動，當較前有更為深入的認知。事實上，政治史以外的其他領域，檔案中也埋有不少令人玩味的訊息，尤其是與中英庚款、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及地質調查所的業務相關者，留待我們發掘。例如，原編號 2-13 英文檔案中，時任英國庚款委員會秘書長的 R. F. Johnston 向丁表示丁須作點事，打亂委員會英方成員中，代表教會勢力的 Adelaide 勳爵夫人及牛津大學漢學講座教授 W. E. Soothill 想混進庚款管理委員會的計劃，否則以二人在英國國內，加上教會的影響力，或會得逞。Johnston 對丁說，Soothill 不怕胡適，對丁則頗忌憚；當 Soothill 知悉丁無法再與會時，在英國庚款委員會會議中，極力要加以掌控。該檔案披露了英方部分成員為控制退還英庚款用途所作所為的寶貴訊息。原編號 34-4、14-6 檔案中，時任官商合辦北票煤礦公司董事長劉垣，向丁提供該礦董事局內，官股、民股雙方就人事布局及經營權較勁角力的情報，實為中國近代企業史不可多得的一手材料。據原編號 25-3 檔案，得悉知名動物學家，時任廈門大學教授秉志就創辦動物研究所的預算經費及研究條件，向丁據理力爭。信末有一段很有趣味的話，值得一提：「然尚有一事弟先須先言之者。將來此所之地點自然須與中央圖書館接近，該館設在何處，弟必須知之。倘為節省經費起見，設在清宮，則研究所亦必須在內，弟難往研究矣。蓋弟清人也，故國之怨，終身不忘。趙松雪為元室修《宋史》，後人譏之；弟不願稍近松雪之形跡也。此事弟只與兄開心言之，願兄勿以此語人，徒惹人笑而生惡感。」這類知識分子的心態及身分認同，或值得進一步研究。原編號 26-22 檔案中，時任地質調查所代理所長翁文灝向丁文江指陳所中困境。「葉左之〔良輔〕擬往南方教書，似只得姑聽試之，但教書太舒服，謝季華〔家榮〕一嘗此味，便不復願調查研究，地質人才又銷一個，深為可惜。……陽曆年底連舊曆年在內，……所中人員平均得薪亦在七成以上。惟因近來生活大貴，所中薪水較低，加之人心不定，風氣使然，故弟雖費盡苦心，而所中仍人懷不滿。在弟對於庚款用途總期避免直接為發薪之用，……惟葉、謝諸君自始即要求儘先發薪，甚且要發清從前欠薪（由全所人簽名具呈要求），弟皆置之不

理，……如發全薪，庚款將無多餘，恐失信用；」「調查所最苦者仍是人才缺乏，薪水不足，而且環境太壞；聰明者官化，安分者因循。北大一停頓，更少新人供給，是可慮也。」（原編號 26-19 檔案）成績卓著的質優研究機構如調查所尚且如此，其他等而下之者更可知，在北洋軍閥治下學術機構不易支撐可見一斑。

儘管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具有多方面的史料價值，但因篇幅所限，而且為免聚焦不明，這裡擬就該檔案中董顯光卷宗所透露的重要政治訊息，舉一反三，說明丁文江檔案的史料價值。按：丁出任淞滬總辦前，即在天津與董過從甚密，相知甚深；在〈我和在君〉一文中董即說：「在他〔丁文江〕的激勵下，我便把我多年的積蓄幾千塊銀元拿出來買了舊的印刷機和鉛字，辦了一張《庸報》。於是我便常常請他替《庸報》撰寫政論。《庸報》正辦後稍有頭緒時，在君受孫傳芳之聘，在上海當了淞滬總辦。他要我去做上海交涉使。」文中董提到丁文江「認為孫〔傳芳〕可以用兵力統一中國，因此他受聘於孫。……後來他發覺孫也不過祇以割據為滿足的軍閥，無意統一中國，再加國民軍統一全國之勢已成，他為使中國人民免受塗炭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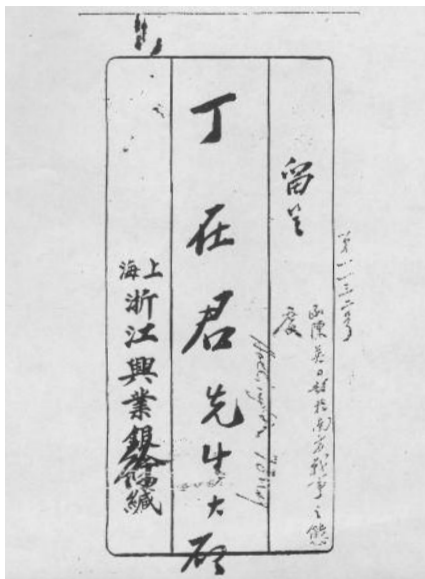
見，便決定對國民軍的北伐作重要的貢獻了。」其幕後貢獻有二：國民軍與吳佩孚在汀泗橋大戰相持不下時，蔣介石叫時為孫部下的蔣百里以私人交誼請丁說服孫傳芳，不要派兵助戰；國民軍攻克汀泗橋後，孫軍費欠缺，遂叫丁和英國政府商借一千萬鎊，丁見到國民軍統一全國之勢不可阻遏，故未如命積極進行。⁴⁵胡適認為「顯光先生和在君曾在天津和在君〔按：原文如此〕同寓很久，他又曾寫蔣介石先生的英文傳記，他的記載應該可信。」⁴⁶事實上，丁到上海履任後，董顯光雖在天津創辦《庸報》，但仍書信往來頻繁，論理他於丁文江去世二十年後所撰〈我和在君〉一文，應



董顯光因辦《庸報》，經營困難，財政窘迫，丁向他提供援助，董所開具的個人收據（原編號 1-14 檔案）。

⁴⁵ 文載《中央研究院院刊》3 (1956)「丁故總幹事文江逝世廿周年紀念刊」頁 136-137。

⁴⁶ 氏著，《丁文江的傳記》，頁 66。



董顯光以徐新六為收信人，由徐轉交給丁文江內容涉及機密的情資（原編號 1-14 檔案）。

該可信。不過談到丁面對國民革命軍北伐，他在孫傳芳集團中所持的態度及其所扮演的角色這些最為重要的問題時，在相關的追憶文字中，董可能因客觀環境變遷，文中反有不少隱諱，記事部分也有因時間久遠，不復憶及而誤導尤甚。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在這方面實大有助於清釐史實，還原歷史面相。

丁文江上任淞滬商埠總辦後，職責所關，實不止上海市政一端。1926年10月26日給 R. F. Johnston 信中說：「除已夠煩的市政職責外，在孫〔傳芳〕控制下的五省，我確實擔當外交部長兼政治顧問。因此我發覺自己必須經常往南京。」⁴⁷京、津地區是當日北洋中樞及外國駐華使館所在，丁文江對這一帶的政情當然不會漠視；他的好友，天津《庸報》的創辦

人董顯光對華北政情的深入觀察及與外人的頻密接觸，對丁來說，甚具情報價值。丁檔內董顯光卷宗共收信十八封，其中董寫給丁文江信十四封（另附 Stephen Wang 寫給丁的信一封）、給徐新六信一封，丁答覆董信一封，丁寫給開灤煤礦主管 P. C. Young 上校信一封，全為英文。另有董發給丁英文明信片一封，內容是請丁送給他英國庚款委員會的最後報告；⁴⁸中文電報一封，內容極為簡略，甚至無法判定日期。⁴⁹董有時會把內容較為機密及敏感的情報提供給丁文江，函中不提丁的名字，而僅稱「親愛的朋友」，以徐新六為收信人，再由徐轉交，⁵⁰信中也沒有署上發信人姓名，但憑雙方心領神會。下面我就董顯光卷宗所收的董寫給丁的信，輔以檔案內其他直接相關資料，按日期先後以類相從，逐一論述如後。

⁴⁷原編號 2-8 檔案。

⁴⁸原編號 1-8 檔案。明信片上注編號第 594，並蓋上海郵局收件日期 30 Jul 26 郵戳。

⁴⁹原編號 39-12 檔案。發自天津，日期及時間為 19 日 23 點 58 分，年月付之闕如。內容是「丁總辦：重要消息電示。光。」

⁵⁰上海浙江興業銀行總經理徐新六是丁在上海最為倚賴及信任的朋友。如丁文江曾函請徐保管其親人遺囑兩件及信函乙件。參 1926 年 1 月 13 日徐寫給丁的信。見原編號 10-2 檔案。又如丁在給胡適的信中說：「我的短處是太粗心，太偏於獨斷。新六在此很可以補救我。不過他也很忙，……我只好揀大的事體，給他商量。」見《胡適來往書信選》上：399；《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23：73。二人非比尋常的交誼於此可見一斑。

丁出任淞滬商埠總辦不久，1926年5月20日董顯光從漢口來函，函中提到19日下午抵漢口，此行是應時在漢口的吳佩孚的請求，為吳處理一些私事。他21日晚便離漢口赴北京，以便及時出席英國庚款代表團的宴會，並安排丁文江夫人赴上海。董原打算赴上海拜訪孫傳芳，把熊希齡就上海關將其所徵碼頭稅，月付香山慈幼院三千圓，作為該院所持有面額六十萬圓一年公債利息的信交給孫。時間所限，他須經北京回天津，無法赴滬。董信中透露決意下月在天津辦《庸報》，以個人資本小規模經營，為此他賣掉所持有數值一萬圓的債券；避免有一天因辦報破產，他設法向朋友拉廣告。他一直考慮透過丁與孫傳芳接洽，願以個人身分照顧孫在華的新聞宣傳，特別是華北外人報刊中的，並代表孫與駐在北京的外交團建立關係；孫傳芳則視其認為合適而按月整筆付給董500到1,000圓作為服務費用。董要以這筆款項支援《庸報》今後兩、三年繼續辦下去。信中董提到他研究了吳佩孚的未來，作出吳「雖為最好的將軍，忠心、正直、無我而真誠，但思想過於保守，不能與時俱進」的結論。董表示渴望為吳效力，但完全吃力不討好，如能找到一個進步的領袖，在天津辦一份有力的報刊為中心，發展他本人利益的同時，也樂意為這領袖效力。如丁文江能玉成這目標，他會感激不置。⁵¹同年6月14日董寫給丁的信中表示因要獨力辦《庸報》，目前無法南下；他希望丁文江能有一天如前所允諾，出任該報總編輯，和他一起辦報。董透露他會用更多的版面留給社會、實業、財金及國外新聞，政治新聞及觀點雖佔版面較少，卻不能或缺，否則報紙會乏人問津。董託丁文江向前時他已在天津接洽過，目前人在赴滬途中的開灤煤礦公司主管 P. C. Young 上校拉廣告，費用是四分一版，每月180元。⁵²董表示人們說他正著手為政黨或為吳佩孚辦報，對此他並不在乎，因真相日久自會大白。⁵³8月11日信中董向丁透露其在天津所經營的《庸報》初開辦時每月的收支、銷售及盈虧狀況。他指出目前收自廣告及銷售平均每月至多1,400圓，惟月支為數達2,400圓，即編輯及管理人員600圓，印刷及排字工人450圓，紙300圓，租金及雜費各200圓，水電費150圓，報業代理、送報童工資及分銷機構補貼各100圓，電話、夜宵（？）、文具各50圓。淨虧為一千圓。董表示一、兩個月也許可頂住那樣的巨大虧損，但若要繼續一、二年，則非力所能及。董一些朋友即說他是笨蛋一名，因他作了不接受津貼的聲明；對《庸報》這份寂寂無聞的報紙來說，即使接

⁵¹原編號 1-10 檔案。

⁵²丁文江果如他所請，直接致函人在上海的 P. C. Young 上校，代表《庸報》向開灤煤礦拉廣告。參考原編號 1-12、1-13 檔案。

⁵³原編號 1-11 檔案。

受津貼也不致敗壞名聲。目前《庸報》發行量略多於一千份，不過獲利的是送報分銷機構。每份售出報紙董只獲銅幣三枚，它們則獲七枚，而每份報紙的紙張董所付出便逾銅幣三枚。如不向它們屈服，《庸報》發行量便無法增長。⁵⁴ 10月5日密函附帶地披露了《庸報》艱苦經營的重要資訊。函中董感嘆辦報工作急迫，財政敷衍了事，每月虧損達八百圓，決定多撐九個月到時看情況如何再說。函中又載前晚（10月3日）他見到司法總長羅文幹，他把徐新六有關上海辦報須籌款數六十萬圓的信給羅，讀信後羅嚇壞了。羅答應給予援助，條件是《庸報》改組成公司；董表示目前對這樣的提議不大在乎。他不準備也不要作資本家的奴隸；報紙要不屬於他自己所有，要不寧願不辦。如資金耗盡，他會把報館關閉或賣掉。⁵⁵ 凡此俱為中國近代報業經營史難得的資料。就以上各信所示，董在天津辦《庸報》前，丁文江已出任淞滬商埠總辦，雖有任該報總編輯的夙約，但政務繁重，他根本無時間，也不便為《庸報》撰寫政論。時特派交涉使為許沅，屬中央任命，按情理丁根本不會邀請董出任該職。董顯光〈我和在君〉一文這方面的記載顯與事實不符。

孫傳芳有沒有以董充當他在華北的外事代表，丁文江檔案中並沒有直接的證據顯示。不過董把大批有關華北政情的重要情報提供其好友，也是孫的「外交部長兼政治顧問」丁文江，並把丁所致送他的重要函電在京、津中文各大報刊中廣為流傳，藉以平息流言，則為不爭事實。1926年6月丁、董的好友徐新六因事往北京，就其在京所見寫信給丁文江，信中說根據董的外交情報，列強在華利害不一，唯近日幾一致作出這樣的表示：北京僅為事實上的，而非合法的政府，故他推斷「《字林西報》新近所持議論以及故意放大某項記載，恐與此種政策不免有呼應之變。」⁵⁶ 8月5日董顯光因天津《益世報》沒有依照孫指示，把就有關是和是戰問題的電報分發天津各報，去函丁文江，請他囑咐孫的秘書廳日後有任何通電交天津時，應把《庸報》也包括在內。⁵⁷ 丁也依他所囑咐，知會相關單位辦理此事。⁵⁸ 10月13日董寫給丁信中指出南方（國民黨）在華北作出有力的宣傳，內容諸如孫傳芳已返回南京，他在前線的部隊已被打垮等等的謠言不時向大眾傳播；在華北，孫實際上已戰敗的印象形成了，如不

⁵⁴原編號 1-9 檔案。

⁵⁵原編號 1-5 檔案。

⁵⁶原編號 10-5 檔案。按該信寫於 1926 年 6 月 12 日。

⁵⁷原編號 1-7 檔案。

⁵⁸按 8 月 14 日五省聯軍總司令部秘書廳政務處長萬鴻圖去函丁文江，函中說：「天津《庸報》係貴友董君創設，於東南建設事業極為贊助，曷勝欽佩！此後如有發表之件，自當分致該報，俾代傳播。」見原編號 30-6 檔案。

1-4

TELEGRAPHIC ADD: "COMMISSION TIENTSIN"
CODE USED: WESTERN UNION
TELEPHONE NOS. EAST 245 & 246

會員委利水流順
Commission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iver System of Chihli

October 13th, 1926.

My dear V. K.

I have received your letter and two telegrams of importance which I have used to the fullest benefit in the Chinese press in Peking and Tientsin. Both of the telegrams have received wide circulation and set at rest wild rumours. The propoganda conducted by the South in North China is very vigorous and every now and then rumours are sprung upon the public to the effect that Sun has returned to Nanking and his forces at the front were crushed, etc. etc. For Heaven's sake, keep on sending war news of value and accuracy every day in the afternoon by telegrams so that I can help you to spread for mutual benefit.

It would not cost you too much, but the benefit you would get would be enormous. With my best regards. In regard to the salt revenue, I have done everything, and I don't expect any trouble in store. I am continuing my efforts. In North China, it appears - the impression has been formed - that Sun is practically defeated. Such an impression is bad indeed if not counteracted.

Yours

1926年10月13日董顯光致丁文江函（原編號 1-4 檔案），函中指陳南方在華北宣傳甚力，丁應在每日午間繼續電傳給他具價值及準確的戰報，以作反制。

加抵制，情況實在不妙。他提醒丁不要因小失大，每日午間應繼續以電報傳給他具價值及準確的戰情，所費有限，而獲益實多。⁵⁹ 1926年11月1日董致函丁文江（參考注⁵⁷），內容是鹽務稽核所會辦 Hussey-Freke 因英鎊匯率高，對發行銀行有利，建議影響北京政府，以鹽餘作抵，由英商 Chartered 銀行及其他外商銀行發行債券三千萬到七千萬圓。Hussey-Freke 表示「以鹽餘作抵的借款數為七千萬圓，為滿足債權人的要求，款數可減至三千萬圓，因財政部所收，常少於借款數六成，便當作已清賬，毋庸再提；債權人應清楚他們如不接受這結算，可能連資本也無法收回。」董告訴署理財政總長潘復這項計畫。⁶⁰

董顯光卷宗內收他給丁文江密函六封，內容敏感而事涉機密，函中絕口不提丁的名字，而僅稱「親愛的朋友」，以徐新六為收信人，再由徐轉交丁。1926年8月11日丁寫給孫傳芳信中說：「頃接天津友人密報，謹摘陳如左：（一）張宗昌新從歐洲購到步槍一萬支，擬成立二旅駐蘇、魯邊境外，復訂購步槍一萬五千支，于八月二日付價三分之一；⁶¹（二）楊麟葛〔宇霆〕為主張和緩國民軍，聯粵攻蘇，以二張〔作霖、宗昌〕攻吳〔佩孚〕為交換條件，已派楊丙南下晤蔣〔介石〕，並託日本人間接向西北軍接洽；（三）京漢方面，軍隊對於玉帥〔吳佩孚〕感情日不融洽，近有擁曹仲帥〔錕〕去吳之謀。」⁶²事實上，這都是8月3日及6日董寫給丁密函的內容摘要；這兩份密函所載的情報，董強調其可靠性無可置疑，⁶³故引起丁高度重視，儘快向南京的孫傳芳報告。按：除了上述內容外，8月3日密函提到田維勤部隊無心戰鬥；Chang Fun-nien（張福來？）將軍承認，如下令這些軍隊移到其他地方，可能促使它們反叛；如任它們留於原地，則或會妨礙在懷來前線代替田作戰的褚玉璞所屬部隊的調動。⁶⁴8月6日密函載有張宗昌對前財政總長王克敏所說一段話：「我陷入困境，進退維谷，如對南口戰事漠不關心，吳生氣，孫向我進攻。我與吳交好，便可避開孫的攻擊。若是吳戰敗，我便要面臨孫的襲擊。吳要是勝利，那便是吳還要我嗎的問題。」⁶⁵這兩份密函所載充分反映出當日北洋軍政局勢的錯綜複雜。

⁵⁹原編號 1-4 檔案。

⁶⁰原編號 1-2 檔案。

⁶¹據 8 月 3 日密函所載，步槍一萬五千支付價三分之一，款數為 60 萬元。見原編號 10-1 檔案。

⁶²原編號 50-24 檔案。

⁶³原編號 1-7 檔案。

⁶⁴原編號 10-1 檔案。1926 年 6 月 29 日吳佩孚向據守河北南口的國民軍發起總攻擊，以田維勤任右翼攻懷來；因田部不斷發生嘩變，故吳佩孚被迫向張作霖建議，改由奉軍任主攻。8 月 1 日直、奉聯軍向南口發起全線總攻擊。

⁶⁵原編號 1-7 檔案。

董在密函中不時把他與北京外交界接觸所獲悉的外人（特別是英、日兩國）對北伐軍攻佔漢口及漢陽，進軍江西後的未來時局的看法，向丁反映。在 1926 年 9 月 27 日的密函中，董強調函中所述，非一般新聞信口胡說，丁不可掉以輕心；他提到過去一週或十天內他注意到「我們的朋友」政策的改變，他與好些位具名望地位的人交談後，更證實這看法。對此他只能斷定「在華南達成了協議」；他認為造成改變的原因有三點。某國使館一位發言人對時局有這樣的看法。「如蔣能把紛亂不已的根源杜絕，建立強有力的政府，帶給這個國家一段必要的和平時期，而我們還要與他作對的話，實與中國利益不符。……在政黨這名詞的確實意義上，國民黨是中國唯一的政黨。它本身具有一種政綱，或會發展成具有憲政形式的政府統治中國。」董認為隨著南軍一面攻佔漢口及漢陽，沿著平漢鐵路推進，另一面則進軍江西，外人遂改變主意。另一促使外人與南方交好的原因是自身利益。他們認為若北伐軍在長江流域失利，還可退回廣東攪局破壞，藉蘇俄援助，北伐軍可免於完全潰敗。正是基於上面兩個原因，尤其是從南軍爲了赤黨〔共產黨〕主義事業的目的，要征服華中而與孫交戰一事看來，英國不但認為與南方修好是明智的，更有這樣作的強烈願望。董的觀察是日本近來的政策也迫使英國改弦更張。不知甚麼難以查明的動機，日本確是希望南軍得勝；英國人則說其中一個動機就是要摧毀英國在華中的勢力。無可置疑兩國政策是相衝突的。考慮到形勢所限，英國在華獨力干預不啻是徒勞無功的任務。英使館一位官員對丁說出下面一番話：「如赤黨成功，列強蒙受其害，無一倖免。赤黨使出最惡劣的手段不外是廢除所有條約，議定新約。如它們有能力將之完全實現，它們也一定有能力維護和平；在華外人商貿隨著維護和平而成長，對英國及他國商人同樣有利。那麼我們便估算好幾年內我們要受的苦，如我們一直所受那樣，但過了這時期我們便會受益。既然如此，反對南方向華北前進又有何用處？」這位官員還提醒董注視未來數週至幾個月內英國主要報章的新聞輿論以證實他們幫他所作的結論是否正確。最有意思的是董在攔筆前，提出爲要更清楚地瞭解局勢，他打算南下看看那些戰事中的頭面人物，包括他在漢口那位同鄉；要是他沒弄錯，1906 年他在奉化龍津中學教過那位同鄉，或是在他到龍津中學任教前一年，那位同鄉便已離校。⁶⁶

10 月 5 日董主要就鹽稅截留，旁及外人對時局觀察及革命黨人活動等政治秘辛，寫給丁一封很長的密函。董在信中提到當天他發現一封來自南京的電報，涉及孫傳芳要把九月分的鹽稅稅款悉數截留以充軍費一事。董在前一次到上海時，即就同樣

⁶⁶原編號 1-6 檔案。按：那位同鄉即 1906 年在奉化龍津中學就讀時受教於董顯光的蔣介石。董爲鄞縣人，蔣爲奉化人，屬浙江小同鄉。

1-6

Tientsin, September 27th, 1926.

My dear friend:

I have just received your recent letter and your reference to our friends not being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the matter to which I made reference in my last two letters prompts me to write again on the same subject. During the last seven or ten days I noticed a change of our friends' policy, and I have conversed with a number of people high in standing and station, and their talks further confirm my views. All I can conclude is that an understanding has been reached in South China.

Three things I assume have been responsible for this change.

Mr. T, of a certain legation, told me: "It would be against China's interests if Chiang can uproot the cause of constant troubles and set up a strong government which will give to this country a period of needed peace.

+ yet we go against him

Kuomintang is the only political party in China in the true sense of the words. Having a platform of its own, it might develop a constitutional form of government which shall rule China. Besides it there is no organization in China which can be called a political party." With the capture of Hankow and Hanyang and with the marching of southern forces on Kiangsi in one direction and along the Peking Hankow Railway in the other direction, these foreigners have undergone a change of their mind.

Self interests might have prompted them to keep on friendly terms with the South. Assuming that the Southern forces are defeated in the Yangtse, they can still return to Kwangtung to raise hell and do a lot of damages. With the assistance of Russians they would still be able to save themselves from a complete defeat.

Great Britain, for these two reasons, considers it wise to be more friendly with the South especially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South, engaged in a gigantic warfare with Sun and aiming to conquer Central China for the Red cause,

1926年9月27日董顯光發自天津給丁文江的密函（原編號1-6檔案），函中董把他與北京外交界接觸所獲悉，外人對北伐展開後的未來時局的看法，向丁反映（內容詳參本文頁24）。

has manifested a strong desire to be on friendly terms with her and to be free from a possible attack on Canton as I indicated in my last letter.

Japan's recent policy has driven Great Britain to undergo a change in policy. That country has undoubtedly been wishing the success of the Southern cause. For what motives it is difficult to ascertain. Britishers say that one of the motives is to destroy British influence in Central China. Two policies conflict - there is no question. Five days ago, for instance, Japanese official spokesmen through the press announced a policy of non-intervention in China - evidently in response to British request for joint action as intimated in a recent circular note to all the Treaty Powers. The following day, British spokesman declared that Great Britain would go into this business alone if ~~it should regard~~ and when she regarded it as necessary and for the protection of her interests.

Taking ~~all~~ the situation into consideration, British intervention alone would amount to too huge a task, and one British officer told me: "Since Japan wishes ~~not~~ the Reds success, and if Reds succeed, all the Powers would suffer equally. The worst which the Reds ~~could~~ do would be the abolition of all the Treaties and the negotiations for new treaties. If they have the power to accomplish all this, they must be able to preserve peace, and with the preservation of peace there would grow foreign commerce in China which would benefit British merchants just as well as other nationals. So, we figure out that for a few years we would suffer as we have been suffering, but after that period we ~~will~~ will benefit. So what is the use of opposing the southern advance to North China."

I wish I could give you the names of spokesmen, but that would cut my sources of information. I am further asked to watch press opinions in the leading English papers for the next few weeks and few months to confirm the conclusions which my foreign friends help me to make. So,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matter. What I have said is more than usual journalistic

3

talk.

I am planning a trip to South China and Central China to get a better grasp of the situation. I would like to see leading figures in the war including my fellow countryman at Hankow. If I am not mistaken, I used to teach him at Lung-king High School in Fenotien in 1906, or he left the school one year before I joined the teaching staff.

With my best regards to Mrs. Tin

Yours as ever,

(三)

問題對丁表示：孫退還一半鹽稅真傻，不知背後有何動機。回華北後，董和王克敏、熊希齡及其他精通鹽務的人談過這問題；他們都認定如孫拒絕匯交專屬中央那部分的稅款，北京得允許四川、廣東鹽進入一向食用江蘇鹽的湖北及其他省分，剝奪江蘇大筆鹽稅，作為強迫江蘇就範的消極手段。經進一步探究，董確信王、熊等所說不符真相，或出於無知，或出於嚇唬。外國鹽務專家指出由於很多明顯的原因，廣東鹽不能行銷到河南，四川鹽也不能行銷於湖北；江蘇鹽在鄂、豫、皖等省的情況則正好相反。熊、王等人所說，長蘆鹽可運送到長江流域，這點也不符事實；孫大可攔住任何滿載長蘆鹽經過南京的船。董衷心希望孫傳芳結束鹽政的混沌，把整筆鹽稅撥充此刻軍事用途及未來江蘇發展，作出持久安排。董想到向北京提出措辭強硬的抗議，目前會被理解為對布爾什維克黨人有利，可能激起民族感情；上上之策是等待，直至戰事終結。董想到若等得太久，鹽稅截留已是事過境遷，重新考慮成為費力的工作，江蘇則可坐享戰果。董對鹽務稽核所會辦 Hussey-Freke 指出，他要取得部分鹽稅，並將之匯交北京的努力不但沒有希望，目前也不討好。董建議丁對鹽稅這事應採強硬而合理的態度，並坦率地向外人表明；董估計他們也會認識到局勢是無助及無望，應讓

他們理解孫一直以來在上海通過丁所作的是正確的政策——外人迫切需要服用包有糖衣的苦瀉藥。董指出為堵住北京的反對，丁應該表明在他管理下徵收到的鹽稅，要比外人掌控下的鹽務稽核所收得更多。

函中董提到寫這封密函當天他在北京會見 Ronald 先生，⁶⁷ 交談的核心內容如下：「我們願意絕對中立，對交戰雙方都不予援助；不過前途看似在國民黨身上，該黨包容具現代思想的人物，不像張宗昌及褚玉璞那樣，我們跟它們會相處得更融洽。」董觀察到過去三週來英國政策凡三變：第一週有利於北方，英提議採用的辦法是——或襲擊廣州，藉以解除廣東對長江施加的壓力，或提供張作霖、孫傳芳每人一千萬圓；第二週內政策對廣東有利，恢復名為疏濬黃埔水道，實際上卻是軍用的貸款討論；在第三週如前述會見所示——中立。一切視戰鬥進展而定。

董在信中首度披露革命黨人在北方秘密活動的重要訊息。董記載上週廣州駐瀋陽的代表蔣作賓，收到張作霖致蔣介石的親筆函，函中張保證提供武器及經費，而非人力的支持。前次通信張稱蔣為「先生」而自署為「張· · ·」，但在此函中張稱蔣為「兄」而自署為「弟」。蔣作賓透過他一位參謀把信送往上海，溯長江而上轉交蔣介石。這封信從大連送出時，露給董一位可靠的朋友看過。少帥張學良不大在乎這政策。為與贊成張蔣聯盟的楊宇霆較量，十日前少帥和 Han Tsung Ling（韓麟春？）一起打電報給老帥張作霖，敦促他逮捕蔣介石的代表。老帥還沒有下定決心，楊以看望父母為藉口返回老家。老帥最後同意發那封信，楊才肯回來。董提醒丁千萬注意這絕不是新聞紙的信口胡言。

函中董囑咐丁設法控制無疑值五百萬圓的華俄道勝銀行大樓。雖然去年海關總署通過前財政總長李思浩，與華俄道勝銀行達成協議——該銀行以大樓作抵押，換取海關總署把關餘存入的特權。

擱筆前，董表明如能為孫傳芳在京、津效勞，請不要客氣；他會「全力以赴，〔董的業績〕附帶地，可作為未來想要加入他〔孫傳芳組織〕時的引薦。」⁶⁸

10月25日董所發密函中，強調函中的消息真實可靠，所載日本前首相清浦奎吾子爵在瀋陽與張作霖有關中國政局的會談內容至為重要。「中國今日所處局面要比辛亥革命時所處的有利。武漢為南軍所有，他們到處都受到民衆熱情接待及主動幫助。

⁶⁷ 疑即其時離任在即的英駐華公使 Ronald Macleay。

⁶⁸ 原編號 1-5 檔案。

辛亥革命時袁世凱從北方操縱局面；今日您〔張作霖〕也擔任同樣的職位。〔這裡彰顯出一副把他職位的重要性減至最低的樣子。〕無論承認與否，您所須面對的局勢現實完全一樣。我〔清浦〕的建議是：您應立即前往天津，必要時留在北京，抓住個人一生中不常來臨的機會。有兩種解決問題的辦法，那就是：政治手段與外交方法。政治手段是指有別於所有其他領袖，您應如袁所作過那樣，為和平解決政治分歧，派出像唐紹儀那樣優秀的人到華南磋商，並善待所有政黨。我所指的外交方法是您應該得到列強的支持，至少樹立列強對您的信任。至於這方面我會最大限度地盡力幫助。因為北京是中國的首都，使您名義上逐漸成為中國的統治者，但實際上您要放手讓南方人管理南方事務；換句話說，中國分成兩部分：華南受南方人控制，華北則在您的支配下。為了達到這目的，您必須克制住對馮玉祥的憎厭情緒，在這方面我也會幫助您。」董認為，清浦子爵提出以上建議部分出於個人原因；據可靠資料，聽說政友會總裁田中義一大將想要控制日本政務，因他是個軍人，故或不受歡迎，便抓一個忠實支持者角逐首相職位。換句話說，清浦為自己力爭首相職位；如他成功，自然會向張提供很大幫助，同時貫徹他的滿州政策。這政策是甚麼？目前還言之過早，難以確定。

信中董接著說，「張受清浦子爵影響相當大，他打算兩週內到天津。清浦訪問張後，潘復立即負使命到瀋陽；他回天津時，帶回來張作霖想要到天津，希望張宗昌打電報歡迎他，並保證到天津與他進行磋商的訊息。潘復這時訪問濟南前，認為張宗昌會打那封張作霖所要求的電報，要是那樣，張作霖四、五日內會到天津，但不知甚麼原故，沒聽到更多的消息。」董估計丁收到這封信時事情真相當可大白，不過他認為張作霖要到天津的跡象很多——北京警察首長變換了；陸軍中將，曾任吳佩孚十四省討賊聯軍總司令部機要處長的劉夢庚的天津住所改建供張使用，其他準備工作繼續進行。這方面或要提及的是張宗昌對爭取直隸督辦職位更為著迷；毫無疑問他會搶到該職位，但也會激起二張之間的惡感。

董指出個人野心引起張作霖冒險投進政治旋渦中，不過更迫切的是充斥市面，面值約 1,200 億的奉票這難題。日本前遞信（交通）大臣藤村義潮男爵在天津與董談話中，提及他與張作霖意見不同，在於張認為藉控制北京局勢，即能抬高奉票價值；對張來說，這是經濟而非政治問題。藤川男爵告訴董，不管怎樣，張決定要支配北京。事實表明，清浦子爵雖鼓勵張控制北京局勢，但他不相信張能把奉票作為經濟問題解決。

函中董提到上星期京津這樣的謠言廣為流傳：徐世昌可能再度成為總統人選（梁鴻志所告），另一位是王士珍，黎元洪也很活躍。所有這些領袖每晚都在天津舉行宴會。段祺瑞的追隨者在這方面的活動也不甘後人。生怕吳佩孚及其他軍事領袖反對張作霖本人隨意出任總統人選，王士珍很可能被提名角逐該職位，張作霖則居副。

談到張作霖與蔣介石的談判，董指出在清浦子爵向張提出意見前便已進行。據非常可靠來源獲悉兩天前張的使者傳回來蔣介石的口信，大意是說，張所建議南軍北進至湖北武勝關，西佔九江及據有江西；換句話說，蔣可接受以黃河為界瓜分中國。為了赤黨的利益，表示對蔣的友誼，奉張與不久前鬧獨立失敗的浙江省長夏超互派代表；張幫助夏搗亂鬧事，削弱孫在前線的地位。聽說孫出發時，拿走了夏超警隊大量最好的武器；夏原有步槍二萬支，其中一些被孫拿走。根據雙方協定，奉張把步槍從瀋陽運送到浙江；不幸的是，夏過早發動叛變。張的行動有二項目的：那就是，討好蔣，給張宗昌攻至江蘇的機會，接著由他本人控制直隸。瞭解張宗昌處境無望，張正考慮擴展到河南；據說他與樊鐘秀、國民軍第二軍和紅槍會眾不斷磋商。⁶⁹

11月17日發自北京的絕密函件中，董記載當日上午他在京與 Francis 爵士⁷⁰一小時半的談話內容，並奉勸孫傳芳應採取的應變措施。Francis 爵士作以下觀察：南軍即將兵臨城下，統一中國為它們的政策。北洋應放聰明點，不要與之相抗；孫注定要失敗，張作霖會被逐出北京，侷促於東三省。南方非赤黨；到北京後，它們感到有責任與外交使團接觸的話，那就更好了。Francis 爵士建議列強應放棄租借地及通商口岸以外的所有特權，它們的國民應集居於租界及通商口岸內以求保護。他說：「假定五年間給南方統一全國的機會，帶給中國和平與秩序，所有具愛國心的華人都會協助南方的運動取得成功。」函中董提到他所見到的英國官員都表達類似的觀點。有見及此，董建議丁利用對孫傳芳的影響力，勸他盡快採取如下抉擇：「1. 自動撤往浙江及保衛上海，秘密勸說山東〔張宗昌〕接管江蘇一部分，使與赤黨交戰；2. 與蔣談和，同意接受〔國民〕黨〔統〕治。不那樣而想要保住江蘇，則孫傳芳除被擊敗外，還要失去浙江。」⁷¹

就丁文江檔案中董顯光卷宗相關資料所見，董在華北為丁蒐集並分析京津政情，特別是外人對時局態度方面，表現相當稱職，他部分觀察也相當敏銳。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支持丁文江為孫傳芳效力，也經常流露要加入孫陣營的意願；出於對激進革命

⁶⁹原編號 1-3 檔案。

⁷⁰疑即海關總稅務司安格聯 (Francis Aglen)。

⁷¹原編號 1-1 檔案。

勢力破壞性的憂慮，他對北伐軍始終抱有相當的保留甚至惡感，這點他與丁文江並無二致。固然隨著北伐的進展，他也表示有興趣與昔日短暫受教於他的蔣介石接觸，並建議孫應與蔣妥協。凡此種種，董在〈我和在君〉一文中都隻字不提，反將丁描繪為亟亟支持以武力統一全國，打倒割據軍閥，對北伐作出重要貢獻的時代前驅。與丁交誼非比尋常，相知甚深的董顯光，¹²在寫了「蔣介石先生的英文傳記」後，竟在「同寓甚久」的摯友去世二十周年時，寫出〈我和在君〉那樣的紀念性文字，並博得高明如胡適的肯定，耐人尋味之餘，也是對歷史的諷刺！要重建真實的歷史面相，丁文江檔案中董寫給丁的信是最可靠的線索。

肆、小結

1. 史語所藏丁文江檔案主要內容是丁在 1926 年淞滬商埠總辦任內的文電。據胡適說，這批文電由丁一位朋友保管；那位朋友應是翁文灝。丁遺囑雖指明其遺稿應由其弟弟文淵及文治整理，不過卻無法實現。根據蛛絲馬跡，較為合理的推測應是上世紀四十年代初翁文灝把這批文電從地質調查所轉交到史語所典藏。

2. 丁文江一生中，以淞滬商埠總辦任內的一段最具爭議性；相關資料又至為缺乏，研究上存在不少盲點。積極方面，丁文江檔案正面價值在於提供新史料，填補了他一生中最重要一段的歷史空白。消極方面，有關這一段歷史，過去研究主要依賴幾種追憶性文字，但或因記憶錯置（有些可能是選擇性的），或因政治忌諱，失實之處甚多，日久則積非成是，該檔案是驗證這些追憶文字的重要座標。

後記：本文初稿部分內容曾於 2003 年 9 月 8 日本所 92 年度第 14 次學術講論會提出，蒙講評人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潘光哲博士惠賜卓見；同事陳光祖博士費神校正誤字，匡我不逮；傅斯年圖書館湯蔓媛、廖淑媚小姐對丁文江檔案整理原則及標準有所是正；兩位審查人提示修改意見；統此致謝！

¹² 當戰局逆轉，孫傳芳前景暗淡時，在 1926 年 11 月 17 日的密函中，董除了報告及分析政局外，並囑丁文江採取預防措施，以策安全。「這是戰爭時期。若非戒備森嚴，您不要走來走去。這不止是為了您的個人安全，也是為了您正在擁護的事業。」見原編號 1-19 檔案。1926 年 12 月 7 日董顯光在給徐新六信中認為如丁離職，至他再度投身政界前，他的幾位好友應在財政上幫助他。徐應和他一樣，隨各人所喜歡認定，丁是天生的政治家或政客，必須留於政界。說：「一年內我的報紙可每月可以二三百圓為度支持他。……我們幫助他解脫困難。……我對他的安康十分關心。」見原編號 1-17 檔案。

1-12 1-1

Peking, Nov. 17, 26.

My dear Friend, You should be advised as to what the British officials here in Peking are thinking about the situation in this China. This morning I saw Sir Francis & had one hour & a half talk. The gist of his arguments is that the South is coming, it has a policy, unification of China, it is better for the north & other leaders not to resist the southern advance. The South must come here by consent or by force. For China it is better for it to come by consent. Sun Chuanfang is doomed to be defeated. Chang Tso Ling should be driven out of Peking & confined to Manchuria. It is better for the south to come to Peking & feel the responsibility by contact with the Diplomatic Body. The South are not Reds. Sir Francis also suggested that the Powers

董顯光自北京致丁文江的絕密函件（原編號 1-1 檔案），內記載 1926 年 11 月 17 日他與 Francis 爵士的談話內容（詳參本文頁 30）。因資訊敏感機密，董在信中沒有署名，函中也不提丁的名字，而僅稱「親愛的朋友」。

2 Confidential

should give up all the privileges outside the concessions & treaty ports where their nationals should be assembled for protection. The Powers should accord no protection to their troops outside the concessions. Si also said "give the South a chance to unify the country & give China peace & order for say five years. All patriotic Chinese should assist in making the southern movement a success."

I saw British officials & they had similar views expressed. The tendency of the time is evident. I suggest that you use your influence with Marshall to ~~the~~ follow the alternative & adapt them quickly.

(1) Retreat to Chetani & defend that voluntarily & secretly, get Shantung to take over part of Kiangsu to clash with the Reds.

古今
論衡

② To negotiate for peace
with Chiang + to agree to the
party rule.

Otherwise by trying to hold
Kiang, Sun will be defeated
& will also lose Chanking.

This is the advice given
after having been in touch with
the movement from the northern
angle.

Be careful about
yourself. This is the time
of war. You should not
move round without
heavy guards. It is not
for your personal safety,
but for the cause you
are championing. What you
should have taken the
precautions.

Reply mine at once,
Yours as ever.